

黎志添 主編

十九世紀以來 中國地方道教變遷

桂洲真武廟碑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整飭金勝等處兵備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

勅整飭安綿等處兵備

老

古昔祀典之制以勞

明興汛螺胡廣炎珍群魁

上帝聖衛之功甚鉅

上命歲時致祭玄嶽報功

居民還神于山麓

民懷心濯慮舉藉自

如聖宣天終惠此海

士以報神聞于

軒豁孟壇瓶磬鐘鼓且

榮公額其上曰真武廟

一水環繞其前紆綠地

而峇景既哉董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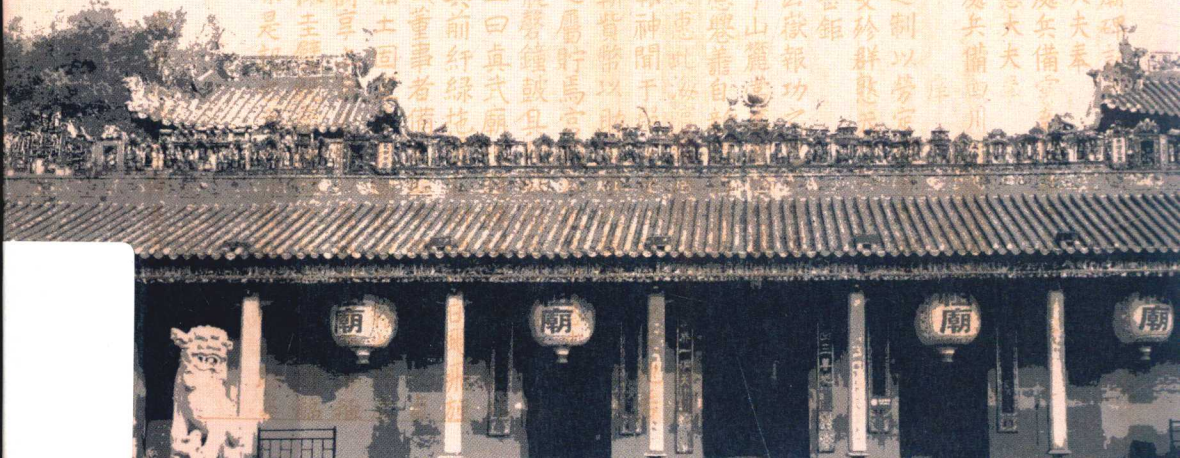
陽而顯靈茲土固

惟清周人將享

即祝史日陳圭

助而在而余是

第廿一



十九世紀以來
中國地方道教變遷

黎志添
主編



責任編輯 梁偉基

書籍設計 鍾文君

書 名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教變遷

主 編 黎志添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 4 樓 A 室

版 次 2013 年 12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68 × 230 mm）51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476-1

© 2013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十九世紀以來

中國地方道教變遷

編者言

十九世紀清中葉以後，內憂外患的清帝國不斷面對戰爭和危機、社會混亂和動盪，以及各種各樣的政治和文化改革運動。至於傳統中國宗教在不同階段遭受的打擊和抑制，更是眾所周知，目前學術界已有很多相關的研究成果。就近代中國宗教的式微而言，我們不得不說道教是首當其衝、受害最深的。施舟人教授在其〈道教在近代中國的變遷〉一文中曾說：「有關道教在清代日漸衰落的歷史，迄今為止尚未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¹最近，由宗樹人（David Palmer）和劉迅（Liu Xun）合編的 *Dao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tween Eternity and Modernity*（《二十世紀的道教：永恆與現代之間》），² 集合了十一位學者的研究，分別以不同地域的個案，探討二十世紀以來道教的發展狀況。這部合著成果可說是回應了施教授所提出的「道教在近代中國的變遷」研究課題的需要。然而，對於理解十九世紀以來這二百年的道教發展，我們相信，一方面，簡單的「日漸衰落」論，不能完整地概括出道教在這段歷史時期出現的複雜性和多元面貌；另一方面，「道教在近代中國的變遷」的研究課題更需要仰賴道教學者對不同地區的道觀、道士或道教組織等個案的觀察，利用方志、碑刻和檔案文獻，進而提出更豐富，甚至是互有差異卻更完整的圖景。只有建立在新研究方法的基礎之上，才能推進近代道教史的研究。

2009年11月26至28日，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國遠東學院合辦的國際道教學術研討會圓滿舉行。這次會議，以「道教與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關係：新的研究方法與視野」為主題，試圖推進「道

教與中國文化及社會」方面的研究，並提倡新方法和新視野的探索與實踐。會議分為「道教經典」、「道教與地方社會」、「道教藝術」、「道教科儀」、「道壇與宮觀」等五個主題，集結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道教學者，堪稱一次道教研究的盛會。

經過三天的講演和討論，與會學者對道教的討論達成了一些共識，比如：道教植根於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土壤之中，並長久地影響中國各階層民眾的生活；新時代的道教研究，應倡導運用碑文、方志、田野調查報告、考古文物等新材料，同時也不應忽視傳統歷史文獻的考證研究。同時會議也收穫了二十五篇沉甸甸的會議論文。收入本集的十四篇論文，是經過割愛篩選後的成果，集中在「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教與社會變遷」這一主題上。

這十四篇論文當中，所涉及的地域非常廣闊，從華北、中原地區的北京（尹志華〈清代北京白雲觀住持〔方丈〕、監院傳承考〉、王宗昱〈北京東嶽廟恢復過程中的問題〉）、河南（吳真〈華北地方社會中的全真道士：以華山法派賡續與公共廟宇經營為中心〉、劉迅〈全真廣學：清末民初南陽的玄妙觀、道士行動與現代改革〉），到南方的湘中（羅柏松〈湘中地區道教的傳入、傳播和發展〉）、嶺南（志賀市子〈地方道教之形成：廣東地區扶鸞結社運動之興起與演變（1838-1953）〉、游子安〈清末以來嶺南地區仙方、善書與呂祖信仰〉），又到台灣（康豹〈鸞堂與近代台灣的地方社群：埔里的個案研究〉、王見川〈清末日據初新竹的道士與張天師：兼談其時台灣北部宗教人物的「龍虎山朝聖」〉、謝聰輝〈大人宮翁家道法外傳及其相關道壇考述〉）和澳門（黎志添〈澳門吳慶雲道院的歷史變遷：十九世紀以來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研究〉）。一書在手，展之可見大半個中國道教的演變與興衰。

除此之外，還有三篇文章，則很難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來界定其所討論的研究課題。如李豐楙的〈注連與解除：道教拔度儀的非常性死亡觀〉，考察的是道教民間的風俗習慣，即研究非正常死亡的拔度儀式及

其背後的歷史與宗教背景；又如高萬桑教授的〈近代中國的天師授籙系統：對《天壇玉格》的初步研究〉，考察的是天師授籙問題；而勞格文的〈道教於中國宗教和文化之所為與無為〉，則是試圖深入探討自有道教以來，它試圖做到的目標（廢除血祭），以及目標是否成功做到的問題。

全書編排如下述。首先，關於台灣地區，康豹以埔里地區為例，向我們展示了位於台灣中部的埔里鎮（屬於南投縣）上幾所主要鸞堂，從清朝移民時期到戰後的發展簡史。他不僅探討了這些鸞堂的地方特色，如相互之間較多的互動與互助，在戰後恢復重建的過程中所接受的鄉紳的支持，以及鸞堂成員的多樣性等等；而且用相當的篇幅，討論了埔里鸞堂對於當地社區的影響，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對公共福利的貢獻，以及通過組織大型齋醮科儀和對慈善活動的參與，而在埔里的文化傳承上所發生的作用，從而正確地評價了這些鸞堂在歷史和社會上曾有過的重要地位。另外，他還進一步涉及到埔里鸞堂的潛在影響，也就是與道教的互動關係。關於這一點，康豹認為，雖然扶乩團體受到道教的深刻影響，並且扶乩也是道教世俗組織的重要活動之一，但是輕易將扶乩團體形容為道教組織則是值得慎重考慮的。這一點提醒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完善近代中國宗教中關於道教和扶乩的一般定義。除此之外，文末的十個附表、三個地圖和一個附錄也值得重視，其中包含了埔里地區有關鸞堂和扶乩的一些詳盡而難得的史料。

與康豹對台中鸞堂的考察不同，謝聰輝所著眼的是清代時期台灣鳳山縣（約今高雄與屏東縣市大部分）的一個道教家族的歷史。他所關心的問題是淵源自福建泉州靈寶傳統的翁家道法，是何時以及如何外傳的，從而揭示清代時期台灣鳳山縣一地，老道壇的道法源流與傳承關係，以彌補學界在台灣道教區域研究方面的不足。一則謝聰輝指出，道教傳法向為秘傳，二則，他又依據翁家族譜以及少見的道法抄本，分析翁家道法的傳承，最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翁家道法，於翁定講時代已

經開始外傳給他姓弟子，如萬錦、陳琦琨之類；另外，紅毛港蘇家和大林蒲吳家則代表了翁家道法外傳的兩種典型模式，蘇家是通過聯姻，而吳家則是拜進翁家學道。謝聰輝通過翁家這個道教世家的例子，向讀者清晰地展示了台灣老道壇的發展歷史，並揭示了傳承過程中對秘傳規則的遵守與調整，對我們瞭解道教的傳法有很大的啓發意義。最後，論文還附錄了所參考的最重要的抄本資料的數據與圖表。

王見川把目光轉向了台灣北部新竹縣，他所討論的是清末以及日據初期台灣北部新竹縣道士活動的情況，尤其是西門林家的林占梅在新竹的活動。文章揭示，林占梅曾往龍虎山拜見張天師，並且承張天師的封賜，為本地城隍廟升格（成為都城隍）。由此出發，文章同時探討了清末日據初期台灣北部宗教人物的龍虎山朝聖事件，從而全面揭示台灣北部地區的宗教活動與江西龍虎山的關係。

同樣是台灣地區的道教，李豐楙關注的是台灣道教拔度儀中對非正常死亡進行的處理儀式。他在文中提出了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的概念，指出在台灣道教拔度儀中有關非正常死亡所引起的生命危機，需要以特別的解除儀式來解除其死亡焦慮和解決有可能引起的問題。而且，這種非正常死亡的觀念（「強死為厲」）以及有關處理方法，具有歷史性和普遍性，自東漢時期以來就有類似的觀念和處理方法。由此本文回溯和梳理了東漢以來有關的注連說和解除術，包括早期的解注器和後來の上章儀式中塚訟的解除術以及台灣流行的轉轍法，目的都在於打破和解除因疫病引起的重複灌注、傳染的不祥狀態，以及對生人的其他不利影響。最後文章指出，由代形、替身觀念所聯繫的三種解除方法，背後都有一個將失序再程序化的模式，和一種死亡觀中的秩序取向心理，而這些儀式都已成為齋醮科儀之一體。

離開台灣，我們把目光轉向廣東和港澳地區，又可以通過志賀市子、黎志添和游子安的論文來瞭解當地的道教和社會變遷歷史。

志賀市子在她的〈地方道教之形成：廣東地區扶鸞結社運動之興起

與演變（1838-1953）》一文裏，敘述了近代廣東扶鸞結社運動的歷史，透過三個系統（呂祖道堂系、先天道系、潮汕系）各自的發展潮流以及相互之間的互動影響的分析，深入揭示了扶鸞與道教之間互相促進的關係。不僅如此，作者還進一步提示出，三個系統的部分人員在 60 年代遷移到香港，以道教的名義集結成立了香港道教聯合會，由此追溯了香港道教的淵源和前身。

黎志添所要探討的是澳門吳慶雲道院在近代的歷史變遷，以澳門仍存在的吳慶雲道院為個案，運用一手的田野考察資料，講述了清代以來，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的歷史。文章不僅詳盡敘述了吳慶雲道院四代相傳的前後經過，以及每一代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出現的新變與沿革，而且敏銳地指出，吳慶雲道院與三元宮為代表的廣東全真教龍門派在科儀方面相互之間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與傳遞。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細緻列出了吳慶雲道院所使用和收藏的正一派科儀本和來自三元宮的科儀本。

游子安著眼於道教、扶鸞與醫療的關係，在〈清末以來嶺南地區仙方、善書與呂祖信仰〉一文中，探討清末以來廣東、香港地區所流行的仙方、善書與呂祖信仰的關係，指出仙方和善書在功能上有交叉現象，仙方除了醫療作用，也有勸善的作用。1890 至 1910 年間嶺南地區疫病流行恰是仙方、善書和呂祖信仰盛行的一個大背景，其中藥簽治病和善書刊行，也是呂祖信仰和黃大仙信仰的核心內容。

在廣大的中國華北地區，道教也並不是沉寂的，而且對當地社會曾有過深入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在吳真的論文〈華北地方社會中的全真道士：以華山法派賡續與公共廟宇經營為中心〉中可以清楚看到。她以河南濬縣一個小山浮丘山為中心，借助於田野考察和地方志獲得的道教碑刻，講述了河南濬縣從宋代開始，迄於清末的道觀發展歷史，用有力的證據向我們證明，在明朝一代，華北地區的全真教並不是處於衰弱階段，當地的全真道士採用了富於智慧的生存方式來應對不利的生存環境。

同樣是河南的例子，劉迅關注的則是河南南陽的玄妙觀。他敏銳地

把握到了清末民初時期，南陽玄妙觀對變革中的社會曾作出的反應。一反傳統的認為道觀是保守力量的代表的想法，論文運用有力而詳盡的證據，證明了玄妙觀在清廷和民國政府推行新式教育之前和同時就已在致力於南陽當地新學校的興辦。不僅如此，而且還在當地的實業教育、醫療、慈善方面都發揮了主導作用。最後，本文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在晚清和民國早期，玄妙觀代表的全真道教在南陽的現代化進程中，不僅不是阻力和障礙，反倒是一種推動力量和主導力量，由此啟發讀者重新思考和判定宗教團體在現代開展過程中的地位。

關於北京，我們收入的是尹志華關於北京白雲觀的論文和王宗昱關於北京東嶽廟的論文。在〈清代北京白雲觀住持（方丈）、監院傳承考〉一文中，尹志華運用各種詳實的資料，集中就有清一代北京白雲觀住持（方丈）和監院傳承的歷史進行了考證。文章不僅論證了小柳司氣太的觀點，即白雲觀祠堂中所奉的二十一代律師中，並非全是白雲觀的方丈，第一至第六代根本與白雲觀無關；而且更進一步考辨，第八代至第十五代律師也未曾住持白雲觀，只有從第十六代以後的律師，才都擔任過白雲觀的方丈。

王宗昱論文的題目是〈北京東嶽廟恢復過程中的問題〉，詳細介紹了北京東嶽廟的恢復過程，指出東嶽廟的恢復工作是由政府來進行的，同時，目前管理東嶽廟的機構，東嶽廟管理處和民俗博物館也是政府組織成立的。雖然東嶽廟從 1999 年開始對公眾開放，2006 至 2007 年恢復了香會的活動，2008 年由道士進駐。但是，新時代背景下的香會和道士團體都已經失去它們以前賴以存在的群眾基礎，而且他們重新開始活動，也是在政府的組織和幫助下進行的，同時，進駐的道士也只有有限的管理權，香會與道士之間也沒有建立像古代一樣的關係。從總體來說，東嶽廟的恢復過程中，政府不僅起到了主導作用，同時也對其恢復程度和方向都起著決定作用。所以東嶽廟的恢復，表面上看是一個有不同力量（政府、道士、香會）參與的過程，實際上只有一種力量，政府的力量。

量，在其中發揮全部的作用，並起了控制其他力量的作用。

羅柏松又引領我們把視線投向了湘中地區，他的論文以〈湘中地區道教的傳入、傳播和發展〉為題，選取研究較少的湘中地區道教歷史為著力點，關於湘中的早期道教發展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史料和觀點。論文首先討論的是南嶽，結合《道藏》中三份文本（《南嶽小錄》、《宋代南嶽九真人傳》、《南嶽總勝集》）來重構南嶽的早期道教聖跡。其次，文章探討了新化縣的重要早期道教場所文仙觀，此觀建於東晉，一直延續到 1949 年。接下來納入作者視野的是，湘潭地區正一派的发展歷史和最終為全真道佔領的經過。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作者介紹了一項新的中國地方歷史國際電子資料庫的計劃。接下來便展示了南嶽聖帝這位普遍流行於湘中地區的代表神祇的演變歷程，對他的崇拜在湘中超過了對所有菩薩的信仰。文章致力於新材料的使用和新視角的發明，對地區性的道教研究方法有不少新的啟示。

最後，高萬桑通過論文〈近代中國的天師授籙系統：對《天壇玉格》的初步研究〉，介紹了重要的有關天師授籙的文本：《天壇玉格》的版本、內容和文獻發展歷程。文章值得稱道之處，不僅在於提供了七種不同版本加以詳細比勘，而且透過不同版本的出現及流傳，揭示了此書文獻的發展小史，以及不同版本出現時的歷史背景，從而反映了不同時期天師府力圖整合地方道教的努力。

勞格文則對道教在歷史上曾做到的和未曾做到的做出了總結。他認為，道教並未完成它所提出的「祭祀革命」（對血祭實行革命）的任務。從這一點出發，他追溯了道教的歷史，分別探討了精英道教和民間道教各自的淵源。作者認為，精英道教的起點是《管子·內業》、《老》、《莊》等道家經典，它們提出了「道」的概念，以取代周朝的「天」的概念；其特徵是向內的冥想，向內求「道」。而民間道教的起點是《列仙傳》、《神仙傳》之類典籍，在祖先地位下降的背景下，出現大量仙人傳說。這些傳說使得早期道教一開始就包含在地方性之中。這兩個傳

統，都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而直到明代，精英與民間這兩個傳統才實現統一。除此之外，勞格文還指出了道教的四個特徵：一是道教為本土宗教；二是道教的科儀根植於產生皇權的漢代宇宙觀；三是對道的崇拜；四是道教包含在地方社會之中。在文章的最後他回答了開頭提出的問題，為什麼道教未能完成對作為中國宗教的核心的血祭革命，乃是因為道教的淵源之一，就是民間宗教中的一些成分。

這次國際道教學術會議，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同時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致力於推動道教研究的一個里程碑。在此，我要衷心感謝各位學者的大力支持和參與，也要對為組織會議付出勞動的研究中心的同事和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宗教研究專業的學生表示感謝。我相信，通過道教學術界各位研究者的齊心協力，一定能把道教研究不斷推進深入。最後，希望各位讀者能從本書中有所收益，這也是我們共同的心願。

黎志添

2013年7月

香港中文大學

注釋

- 1 施舟人：《中國文化的基因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150。
- 2 David Palmer and Liu Xun, eds., *Dao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tween Eternity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目 錄

編者言 i

鸞堂與近代台灣的地方社群：埔里的個案研究 …… 康豹 1

大人宮翁家道法外傳及其相關道壇考述 …… 謝聰輝 71

清末日據初新竹的道士與張天師：
兼談其時台灣北部宗教人物的「龍虎山朝聖」 …… 王見川 133

注連與解除：道教拔度儀的非常性死亡觀 …… 李豐楙 157

地方道教之形成：
廣東地區扶鸞結社運動之興起與演變（1838-1953） …… 志賀市子 183

澳門吳慶雲道院的歷史變遷：
十九世紀以來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研究 …… 黎志添 221

清末以來嶺南地區仙方、善書與呂祖信仰 …… 游子安 251

清代北京白雲觀住持（方丈）、監院傳承考 …… 尹志華 283

北京東嶽廟恢復過程中的問題 …… 王宗昱 317

華北地方社會中的全真道士：
以華山法派賡續與公共廟宇經營為中心 …… 吳真 341

全真廣學：清末民初南陽的玄妙觀、
道士行動與現代改革 …… 劉迅 383

湘中地區道教的傳入、傳播和發展 …… 羅柏松 417

近代中國的天師授籙系統：對《天壇玉格》的初步研究 …… 高萬桑 437

道教於中國宗教和文化之所為與無為 …… 勞格文 457

撰文學者簡介 472

參考書目 477

鸞堂與近代台灣的地方社群：
埔里的個案研究¹

康豹

緒論

隨著中國大陸、台灣和海外華人社群研究環境的持續改善，更為豐富的材料開始進入學界的視野——包括檔案、家譜、碑文、帳簿、科儀本和口述歷史——用來描述地方宗教傳統的發展歷史及其在近代社會所面臨的挑戰。²目前，關於中國大陸扶乩社群的研究也已經開始出現類似的情況。正如高萬桑和宗樹人在他們即將出版，關於近代中國宗教歷史的書中所指出的：³扶乩社群在追求信仰救贖（永生、開悟）的過程中更專注於個人修持，而在這一層面上，這些群體可能更適合被劃分為自發性組織（與傳承性社群相對，諸如地方公廟、宗祠和宗教社團等）。中國的自發性扶乩組織數量繁多且種類多樣，既有由道士主持的宗教團體，也有由世俗信眾組織的以進行扶乩和慈善活動為主的善堂。一直以來，扶乩（也稱扶鸞、降筆）儀式都深受中國精英階層的追捧，從六朝士族陶弘景（456-563）到清末參加科舉的舉子，都以不同程度參與扶乩儀式。⁴至清朝晚期，扶乩活動尤為興盛，⁵且對道教各宗派及其相關道教運動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並延續至今。許多民國時期的文人也參與扶乩活動，例如許地山（1893-1941）曾詳細地研究和撰寫了扶乩活動的歷史；⁶而丁福保，則將扶乩作為一種宣揚佛教教義的方法。⁷

目前有關台灣自晚清到現代的地方社群宗教歷史的研究成果豐碩，包括 Donald deGlopper（德格洛柏）對鹿港的研究，Stephan Feuchtwang（王斯福）非常經典的對台北主要廟宇的研究，筆者對廟宇在新莊（台北縣的下屬市）街鎮發展歷史中角色的個案研究，Steven Sangren（桑高仁）對大溪鎮（桃源縣的下屬鎮）宗教與社會的研究，Kristofer M. Schipper（施舟人）對台南廟宇如何構建當地城市生活的研究。⁸相較於以上這些近代台灣宗教的研究，對台灣扶乩廟宇（通常稱之為「鸞堂」）社會史的討論，特別是其對地方公共生活的影響方面的討論仍然較少。在過去幾十年關於這些鸞